

# “意义世界”范畴与交界面的符号哲学阐释

胡易容

**摘要:**“意义世界”的形成,是符号学的核心论域,也是文化传播发生的处所。围绕“意义世界”的边界、范畴及交界面所展开的对话,是当代学术语境下明晰辨析“意义世界”不可绕过的课题:首先,在“人文”与“科学”关系重构语境下以整体性的“知觉”调和“认知”与“感知”的矛盾;其次,以“符号物观”重新审视卡西尔关于“物”与“意义”的“此消彼长”论;最后,结合当代技术与人文融合语境,以“信息”作为客观秩序规定性,以达成“获义意向”与外部世界的联结。

**关键词:**意义世界;文化传播;符号哲学;信息论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23)05-0159-10

## 引言:何谓“意义”?

“意义”一词,如此普遍却又如此宏大晦涩,它是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是人之为人的存在基础。若从日常使用来看,“意义”的界定大致包括两方面意涵:一是事物所包含的思想和道理。其意思略偏向于英文中的“meaning”,若对应皮尔斯的符号表意三分法,较为接近他所说的指示符(index)的意涵,我们权且称为“指向性意义”;二是指向其作用、价值,是对所指向“意思”的价值判断和再解释,偏向于英文中“significance”,我们可称之为“价值性意义”。价值性意义更接近于由反复赋义而累积的“象征符”,它必须以指示性意涵为基础,这也符合象征符以反复指示为基础的逻辑。这两种指向几乎涉及人类理论与实践的全部终极指向。正如梅洛-庞蒂在他的《知觉现象学》中指出,“因为我们在世界上存在,所以我们被判定给了意义”。<sup>①</sup>康德以来,自然科学逐渐与人文学发生分化进而形成了对世界的两大类不同观念。其中,自然科学偏向于客观真理之发现,指向追求事物所包含的客观规律;而人文学则融入了更多的“价值追问”,强调人的参与和创造。海德格尔所倡导的“诗意的栖居”正是对人的生存方式“意义”的终极追问。这当中,既包括对“指向性意义”的求索,也包括对“价值性意义”的实现。

尽管所有的人类理论多多少少都关乎“意义”,但不同学科和理论与意义的关系远近并不相同。自然科学所追求的客观真理是一种“指向性意义”,其探求过程要避免“价值性意义”对研究的客观性产生干扰。相应地,人文学与“价值性意义”的关系更为密切。而哲学作为世界观的普遍问题之学,其关照意义的方式是根本性的。具体流派的哲学或许更具有人文色彩,但就其“爱智慧”的出发点而言,是对一切意义的探求。各门类具体科学或哲学中的分支则常常将“终极意义”悬搁一边,而通过具体的范畴限制、语境设定来处理更为具体的意义。例如,梅洛-庞蒂的哲学又被认为是“意义哲学”,即是由于,他将意义问题作为其哲学的本体论,并以此构建了他的知觉现象学。<sup>②</sup>

**作者简介:**胡易容,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成都 61006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当代艺术提出的重要美学问题研究”(20ZD04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冷门“绝学”与国别史专项课题“巴蜀符号谱系整理与数字人文传播研究”(2018VJX047)

<sup>①</sup> 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上海: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6页。

<sup>②</sup> 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的首要地位及其哲学结论》,王东亮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66页。

哲学偏向于将意义问题悬置于一个本体论的终极位置,而符号学更直接面向意义问题本身。符号学作为一种形式论,它既有面向“指向性意义”的一面,也处理“价值性意义”,因而也被称为“意义学”。例如符号逻辑研究及其延伸出的人工智能等当代科学应用研究,就偏向于自然科学的“指示性意义”;而它在近现代百余年学科发展所主要展开的语言、文学、艺术以及更宽泛的文化研究则非常注重探讨这些文本的“价值性意义”,故此符号学也常被视为人文学的方法论。此外,在人文学的各种方法论中,符号学又因其注重形式研究、强调逻辑和理论模型建构而被称为“人文学中的数学”。<sup>①</sup>

通常,符号学常被视为一种具体文本形态或体裁的“意义”分析操作方法(如语言符号学、图像符号学),或社会文化层次的意义分析(宗教符号学、社会符号学),但实际上,作为意义学的符号学也并不回避对终极“价值性意义”的追问,并从意义学内部向一种“意义哲学”不断推进。例如,卡西尔(Ernst Cassirer)提出“人是符号动物”,从“符号使用”的角度丰富了对人的本质属性的认知,是对哲学终极问题“人的意义”的里程碑式贡献;皮尔斯(Charles S. Peirce)说,“宇宙充满符号”而试图将符号作为一种世界的基础要素;迪利(John Deely)在《符号学对哲学的冲击》中追问:“符号学如何将传统恢复为哲学?”<sup>②</sup>无论是迪利的“恢复”,还是塔拉斯蒂的“回到”,都是对符号学构建其哲学基础的必要性的共识。这一哲学基础又将为当今社会的现实境况提供理论依据。赵毅衡围绕“文化社会”探讨了一种“中观”层次的意义世界。他既不赞成詹姆斯(William James)“每个人一个世界”那样过于碎片的处理方式,也不接受于克斯库尔(Jakob Von Uexkull)按照“物种分类”建构的生命域意义世界。赵毅衡提出,人类认知之外的物世界可以“存而不论”,他将意识面对的“事物”(物、文本、意识)作为意义世界的范畴,<sup>③</sup>试图提出一种为“人类文化”提供基础的“意义世界”方法论。这不仅关乎作为意义“哲学”的符号学核心论域,也是当今人类文明冲突此起彼伏语境下,重构一种和谐共存的“人类意义共同体”必须解答的基础问题。由此,本文尝试以其中“意义世界”的对立范畴的探讨为起点,通过思考意义世界分别与“自在世界”“物世界”“客观世界”的关系来探讨意义世界的处所、范畴及交界面,其具体涉及的问题分别是:

- 一是,“自在世界”如何进入“意义世界”?
- 二是,“物世界”与“意义世界”是否“此消彼长”?
- 三是,“客观世界”如何向“意义世界”显现?

## 一、“自在世界”通向“意义世界”的渠道:“感知”或“认知”?

要处理好“意义世界”范畴问题,首先需要有一个参照系,即我们如何界定意义世界之外是什么?

符号学家卡莱韦·库尔(Kalevi Kull)在“四度自然说”中,提出“绝对的荒野”(absolute wilderness)来说明“作为自然本身的零度自然”(Zero nature is nature itself)。从库尔随后对零度自然的补充界定来看,其本意是指与人类没有任何关系的“自在世界”——他指出,“零度自然是“从自然到自然”,以及“零度自然是‘在外’或‘原来就在’(‘out there’ or ‘in here’)”。但库尔在描述零度自然的时候,的确“不经意”地涉及了某种被人类意义世界“污染”的可能。例如,他解释“零度自然是生物学家想要描述的自然”<sup>④</sup>时,忽略了生物学家作为人类认知主体的基本事实。不过我们仍然可以沿着库尔“荒野”这一举例可能造成的误解讨论自在世界的边界。赵毅衡的解释是

①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0页。

② John Deely, *The Impact on Philosophy of Semiotics: The Quasi-Error of the External World with a Dialogue between a “Semiotist” and a “Realist”*, South Bend, Indiana: St. Augustine’s Press, 2003, pp. 51-89.

③ 赵毅衡:《哲学符号学:意义世界的形成》,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4页。

④ K. Kull, “Semiotic Ecology: Different Natures in the Semiosphere,” *Sign Systems Studies*, vol. 26, no. 1 (1998), pp. 344-371.

“意识所及范围之外的物，尚未被人感知，依然是浑然自在的物世界”。<sup>①</sup> 在他的探讨中，“感知”至关重要，这与梅洛-庞蒂“一切意识都是对于知觉的意识”<sup>②</sup> 的观点具有共通性。

值得追问的是，我们如何理解和使用“感知”这一术语？感知，通常被解释为“客观事物通过感觉器官在人脑中的直接反映”，<sup>③</sup> 其根基是官能性和生理性的；与此相对的概念是“认知”，侧重形式和知识。<sup>④</sup> 若将“官能性”的感受作为“自在物世界”与“意义世界”的分水岭，是否会存在与库尔的“荒野”说同样的问题而对意义世界之所及有所疏漏？例如，“物理学热衷讨论‘平行世界’，但是我们无法感知，至今也无法证实（虽然从数学上能推理）另一个平行世界的存在”。<sup>⑤</sup> 这一判断，引发了意义世界的边界是否包括数学这类形式科学认知范畴的问题。类似的例子，在冥王星被望远镜观测到之前，它曾是一颗存在于数学公式推演里的行星。<sup>⑥</sup> 如果数学推理不能作为冥王星进入我们意义世界的依据，以何种标准来判断冥王星进入意义世界呢？是被牛津学童威妮夏·伯尼（Venetia Burney）以冥界之神普鲁托（Pluto）为之命名？或是望远镜“看到”？还是采集到样本？现代科学的许多发现，都是先由数学计算推演，而后被物理实验、观测佐证；人类有限的感知能力接触则往往非常滞后。类似的例子，如：黑洞、基因、引力波、夸克、上帝粒子。迄今仍然有很多对象如，暗物质、反物质、暗能量等，仍存在于数学推演之中。如果按照被“感知到”的要求，它们就不得不被排除出我们的意义世界。

问题的实质，是从文化社会的场域出发，人类意义世界是否要越出“感知”世界，而进入包括形式科学在内的“认知”世界？从符号学作为一门“人文科学”的逻辑来看，恪守“人类的感知”是符合“文化意义”需求的。这也是符号哲学家卡西尔的立场，在他看来，“科学可以从物体下落运动推而广之，并引申至那充塞宇宙整体的万有引力定律。这种普遍性乃是人文科学所不能企及的。人文科学无法否定其人类本位主义色彩”。<sup>⑦</sup>

卡西尔的论辩，是以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分殊为根据的。然而，在人类意义世界这一宏大话题的语境下是否涵盖数学、逻辑学等形式科学构筑的“意义世界”，也即是在重新考虑人文学与自然科学在形式论意义上的“共通性”。从人类文明实践来看，人类意义世界的扩大史，是从纯然依赖官能感知持续向认知为感知提供模塑框架的转化史。人类与动物的感知官能，有生命形态的差异而没有功能性质的区别。很多动物的感知能力甚至高于人类——鹰有更锐利的视觉、蝙蝠有超声波、蛇有红外热感应等等。而人的意义世界之所以更丰富，是由于越出官能性感知，进入了认知世界。面对自然界，人类文明诞生以来所能感知到的对象世界依然具有共通性——“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而人们所感的意义已经大不相同。从天圆地方的构想到日心说的颠覆，再到宇宙大爆炸乃至今天的“平行宇宙”诸论，不断丰富意义是以不断丰富认知为框架获得的解释结果。换言之，人类之外的动物受困于其“感知世界”，而人类具有更高的世界认知能力以及在认知基础上以实践改造

① 赵毅衡：《哲学符号学：意义世界的形成》，第16页。

② 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的首要地位及其哲学结论》，第4-5页。

③ “感知”是感觉和知觉的统称，是客观事物通过感觉器官在人脑中的直接反映。感觉反映客观事物的个别属性，是各自孤立的、相互隔离的；知觉反映客观事物的整体，是各种感觉和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的集合。参见张永谦：《哲学知识全书》，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

④ “认知”从希腊文源头那里意即“知识”或“识别”，是最广义的知识，既指认识活动或过程，又指知识本身，它包括知觉、记忆、直觉和判断。经院哲学家认为，任何被认识的东西，作为被认识了的东西都是进行认识的灵魂的偶性，因而都是被一个提供知识（informing）的动因引起的。参见蒋永福、吴可、岳长龄：《东西方哲学大辞典》，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

⑤ 赵毅衡：《哲学符号学：意义世界的形成》，第4页。

⑥ 与冥王星情况类似，最近，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研究人员发现，一个巨大的天体正在沿着奇怪的、高度拉长的太阳系外轨道行进。他们在美国《天文学杂志》上发表论文称，尽管尚未直接观测到这颗天体，但已通过数学建模和计算机模拟，确认其是太阳系名副其实的“第九大行星”。参见 <https://baike.baidu.com/item/九大行星/464025#10>，2018年6月6日。

⑦ 恩斯特·卡西尔：《人文科学的逻辑》，关子尹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123页。

世界的能力。

面对当今时代的科学技术革命的冲击,人文学与自然科学正在发生更深刻的对话与互相渗透和冲突,人文学与自然科学之间那种泾渭分明的边界正在经受新的挑战。当中既包含物理学向哲学发出的挑战和冲击,如霍金(Steven Hawking)声称,“按照传统,这些(宇宙的本源)问题是哲学要回答的问题,但哲学已死。哲学跟不上科学的步伐”,<sup>①</sup>也包括人工智能等新兴科学领域迫切需要包括语言学、文学、艺术学等人文学的知识协同。由此,卡西尔基于“人文”与“科学”二分的逻辑指责以数学形式为本质特征的精确科学的“反文化”,<sup>②</sup>其基础就不存在了。当前的问题,不是如何在二元对立的框架中修修补补,而是找到更深刻的协同。在符号学内部,这种分治观念已经不再是符号学学科论域的园囿。结构主义之后的符号学浪潮,已经越出了其提出之初那种门类的局限,它与现代科学的影响一道,成为了更为广泛的“领域”的共通方法论。

如果将人类形式逻辑的认知世界(当中有许多“感知”之未及)作为意义世界的组成部分,将使意义世界的边界有所扩展。但这些对象的形式特征及其与现实世界的关联方式的确与卡西尔在“人文”与“科学”的二分范畴中所限制的“人文对象”有一些不同的性质,这是由于,形式科学“认知”的意义世界,与“感知”构筑意义世界方式和结果有所不同。

以幻想、梦境和文学等虚构的意义世界为例:现实发生关联的方式上,文学虚构和幻想保留了现实世界一些内容质地感——细节、片段而获得“身临其境”的“拟真”知觉体验,但这些“体验”不负有普遍有效的事实兑现之责;<sup>③</sup>与之相反,形式逻辑认知诸学科(理论物理学、数学、逻辑推演等)则在内容上抽去了现实世界的各种“殊相”,而保留了结构“形式”,且如卡西尔所说,这种形式是普遍有效的。在系统完备性方面,幻想、梦境和文学虚构不要求全域性的细节完备性,只强调感知体验效果;而形式科学则必须追究系统内部任何细节的逻辑自洽性。赵毅衡提道,“文学艺术、思维想象具有相当紧密的思索,内在因素足够连贯,……(长篇小说、电视剧)细节量足够大。他们至少局部地逼近了一个逻辑整体”。<sup>④</sup>细加考察便可发现,无论篇幅多长的小说、电视剧,其文本的细节都仅以满足读者的感知为目标来设定。越出这个范畴,便不能追问其逻辑自洽性,也不能获取更多细节。这与3D游戏的体验非常类似。在游戏虚拟世界中,游戏者看到的所有对象,都是围绕游戏线索关卡展开的,游戏者只能在规定的有限路线上航行。越出这个方向,就是视界的禁区,由于没有提供后台元数据,那里也就没有任何可供观看的对象,只有马赛克。

与虚拟数字游戏的世界一样,文学文本的世界、梦境、幻想没有现实世界那种不言自明的“无限连续性”。文学文本的读者与作者订立的阅读契约是“只在此处”,双方心照不宣。一部武侠小说里,整天打打杀杀的江湖儿女们似乎从来不用为平日生计奔波。所展示其吃喝拉撒之类的生活细节,也必是服务于侠义、爱情、忠勇、豪气“母题”的需要。孙金燕指出,“它征用现实世界细节,目的不在于对其真实性负责,而是要形成关于现实世界‘整体’的假象”。<sup>⑤</sup>与此相反,形式逻辑认知推论出的世界必须是逻辑自洽的,其可提供细节是无限的:一根直线、一个平面、有理数序列都是一个无限延续的逻辑事实。我们通常示意的线段、平面,只是为了交流的便利而提供局部示意。

由上,如果符号学自设为讨论“意义世界”的学问,其全域就不得不包括连同形式科学指向的

① Stephen Hawking, *The Grand Design*, New York: Random House Digital, Inc., 2011, p. 5.

② 卡西尔认为,“以数字形式呈现的科学和知觉的区别在于它要求严格的确定,而知觉却满足于单纯的‘估计’(schätzung)。这种以严格的数字化构建的世界,恰恰是以褫夺人的事物世界的灵魂为代价的。在这样一个自然的图像中,人类的文化是难以觅得一栖迟之所与归宿的。”参见恩斯特·卡西尔:《人文科学的逻辑》,第121页。

③ 这里分为虚构体裁与纪实性体裁两种情况:虚构体裁完全不负有兑现之责,其未来是否能够发生与现实的某种契合,从而转变为“可能”,则与其与现实的交互影响有关。如,科幻小说根据科学事实展开联想(硬科幻尤其如此),未来的发展的确与之可能有相似之处;同时,科学发展也可能受到幻想的启发而成为一种发展事实。纪实性体裁的文本兑现也仅仅指代个别事实的对象,而不负有普遍有效之责。

④ 赵毅衡:《哲学符号学:意义世界的形成》,第8页。

⑤ 孙金燕:《现实、虚构与想象:武侠文本的符号述真与解读错觉》,《西南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意义世界。当然，在这个总体意义的意义世界中，不同论域的学者可以分别就其主要研究对象来设定其“核心论域”（如前文提到的生命意义世界）。实际上，皮尔斯符号学的另一个名称就是“逻辑学”，他说，“所有的思想都是借助符号得以表达的，因此，逻辑学可以被看作是一门有关符号之普遍规律的科学”。<sup>①</sup>艾柯（Umberto Eco）对符号学研究的三种论域，就直接主张包括“形式逻辑”和“形式化的语言”。他认为“从代数到化学，毫无意外，这些语言形式都在符号学的研究范畴之中，与这些领域探索有关的是数学结构的研究”。<sup>②</sup>

综上，狭义的官能性感知不能完全处理“意义世界”的全域，或可借用梅洛-庞蒂的“知觉”一词实现“感知”与“认知”的整合与扩延，用他的话来说，即是“被知觉的世界是所有理性、所有价值及所有存在预先设定的前提”。<sup>③</sup>这也符合符号学作为意义“形式论”与“形式科学”（formal sciences）<sup>④</sup> [艾柯称为形式语言（formalized languages）] 的整合。这种广义的意义形式论视域下的“知觉符号学”，既是“感知”的，也是“认知”的，具有跨学科包容性——既可以实现意义殊相的再现，也包含了形式规律的抽象。当符号作为殊相连接对象时，符号呈现为“个别符”（sinsign），当符号承担形式抽象之责时，其反映的是事物的范畴和类型。皮尔斯符号学的三分中，型符（legisign）即是指符号对“品质一般类型的确定”。<sup>⑤</sup>艾柯说符号必为类型，意思是任何一个符号表意，背后必然有一个意义的类。<sup>⑥</sup>

综上，“自在世界”脱离其“自在”而成为“意义世界”的对象，未必是被感知到的，而可能仅仅是逻辑认知的结果。无论是我们直观感受到，还是逻辑上通过推演认识到的世界，都不再是纯然的“自在世界”。用卡西尔的话来说，即：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中，而是生活在一个不可倒转的符号宇宙之中了。<sup>⑦</sup>不过，自在世界进入意识被感知或认知的程度是有深浅之别的。爱因斯坦计算了“黑洞”的存在，此时，黑洞已经不再是纯然的“自在”了，而当代天文学家有幸通过先进技术观测到一个黑洞，使得我们对黑洞的认识有了“感知”的进一步佐证，我们对黑洞的认知更深入了——其在意义世界获得了更丰富的理解和阐释。

## 二、“自在世界”是通过“物理实在”退却进入“意义世界”吗？

### （一）“自在世界”与“物世界”

“自在世界”与“意义世界”似乎呈现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人类借助科技设备扩大了“感知”能力，而随着包括科学在内的人类总体知识的增加，也提升了“认知”能力。近代以来，随着这种能力急剧扩展，人类曾经认为太阳之下无新事了。正如牛顿物理学之后数百年，物理学曾被认为已经穷尽了运动的所有规律，直到量子力学的出现才击溃了这种无知自满。现代科学发展促进人类认知能力仍在继续飞速增长，这个过程是否如卡西尔所说，“人的符号活动能力（Symbolic activity）

① 皮尔斯：《皮尔斯：论符号》，赵星植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7页。

② Umberto Eco, *A Theory of Semiotic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11.

③ 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的首要地位及其哲学结论》，第5页。

④ 在此，有必要重新对“科学”的定义与范畴稍作辨析。“科学”一词由近代日本学界最早用于对译英文中的“Science”及其他欧洲语言中的相应词汇，欧洲语言中该词来源于拉丁文“Scientia”，意为“知识”“学问”，在近代侧重关于自然的学问。科学的范畴在当今“技术”发展的背景下因与“技术”连用而常常被等同于“科技”或“自然科学”。数学本身是否被恰当地归类为科学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一些思想家认为数学家是科学家，关于物理实验是无关紧要或数学证明等同于实验。其他人并不认为数学是一门科学，因为它不需要对其理论和假设进行实验测试。数学定理和公式是通过推理公理系统的逻辑推导而获得的，而不是经验观察和逻辑推理的结合，后来被称为科学方法。一般来说，数学被归类为形式科学，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被归类为经验科学。参见 Mario Augusto Bunge, *Philosophy of Science: From Problem to Theory*, Piscataway: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8, p. 24.

⑤ 皮尔斯：《皮尔斯：论符号》，第52页。

⑥ 翁贝托·艾柯：《镜像》，张颖译，《符号与传媒》2011年第1辑。

⑦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33页。

进展多少,物理实在似乎也就相应地退却多少”?<sup>①</sup>

此问题引出两个方面的考量,一是,“自在世界”是否就是“物世界”?二是,他们与意义世界的关系是否“此消彼长”?看待这两者的关系涉及到他们作为被认知对象的世界的分节方式,而区别于前文从“人”这一端谈的知觉方式。

第一个问题,是哲学界讨论已久的“自在世界”的范畴,须在世界构成的总体框架下讨论。这个总体框架是这世界分节的全域。蒙昧时期的人类以信仰代替哲学,将世界视为由某种超越力量主宰;古典朴素自然主义哲学将世界视为由某种匀质的微粒原子构成,或视为某几种基础物质相生相克。此后对世界的本源逐渐发展至一种抽象的“工作假定”。如,古希腊的柏拉图的“理式”,亚里士多德以后各种对“存在”范畴的讨论,黑格尔的用语“绝对精神”,都涉及对这个总体框架的讨论。此处对“自在”的讨论是相对“意义世界”而言的。

首先,是“自在”与“物”的关系。两者虽然意义不同,却分别与意义世界相关的“精神世界”或“经验世界”能形成一定对立关系而被联系起来。以康德的“物自体”(Ding an sich)观念为例,在他看来,“经验世界是一个复杂的表象,它的存在和联系只发生在我们的再现(representations)中,而后者也并不是物自身,而仅仅是我们再现的模型(mode of representation)”。<sup>②</sup>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康德的“物自体”的用词“Ding”本义并非物理学意义上“物质”而是更广义的“事物”,其在英文中的对译是“Thing-in-itself”。汉语将其译为“物”而易于陷入一种“物理学”式的“物质观”中。“物世界”与“自在”常常并列在一起。如赵毅衡指出,“自在的物世界,不仅是混沌,而且是无法给予符号化意义化的未知世界”。<sup>③</sup>为了避免容易混淆的“物”观,他特别表明,对象世界的“物”是包括非意识本身的各种事物(如物、生命、文本……)。

沿着这一思路,将“自在世界”视为一种“未知世界”或“混沌”,那么,绝对意义上的“未知”就只能在“未知”一词自身的意义上言说。任何词语的修饰,至少可能在“某种意义上”已然被“知觉”了,进而陷入与前文提到的库尔那个“荒野”的例子一样,有陷入某种“概念化”的嫌疑。比较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与萨特(Jean-Paul Sartre)使用“存在”这一术语的区别也能看到,海德格尔并不满意萨特对“存在”充满主体意识的解释。在他的解释中,作为存在者的人只是“此在”之在。此在之生存于世界,意义已经在了——也即已经进入了“意义世界”。

## (二)“物世界”与“意义世界”的“间性”

由此,若将“自在世界”等同于“未知世界”,实际上,相当于将整个世界设定为一个总量,而“意义世界”就相当于“已知世界”,进而形成了一个简单的此消彼长的关系。前文提及的卡西尔关于“物世界”与“符号活动”此消彼长就是这一逻辑的推论。沿着这个思路,意义世界则不得不在“符号性与物性这两个极端之间滑动”。<sup>④</sup>

这里的关键误会在于,将“自在世界”与“意义世界”的关系置换成了“物理实在世界”与“意义世界”的关系。

首先必须承认意义世界中有“物”性,但物性本身(无论是哲学之“物”还是物理学之“物”)并非那个自在世界的“混沌”,而是由获义意向照亮的结果。也即,此“物”是被对象化和符号化赋义的称谓方式。人类的感知与认知实践赋予世界以秩序之澄明,而使之从意识之外的混沌中被照见。在这种意义世界认知之光的照亮下,褪去的只是“混沌”和“未知”的黑暗,而不应是清晰明白的“物性”。“物性”不仅不因意向的照亮而褪去,反而是被照亮的性质之一。不仅如此,人类通过反复的意义实践,不断创造新的“物”态,持续丰富“物”的意义——在消费社会中,可视为符号对物

①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第33页。

② I. Kant, *Immanuel Kant: Prolegomena to Any Future Metaphysics: That Will Be Able to Come Forward as Science: With Selections from the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42.

③ 赵毅衡:《哲学符号学:意义世界的形成》,第17页。

④ 赵毅衡:《哲学符号学:意义世界的形成》,第10页。

的“溢价”。现实生活中，一块未经雕琢的石头，因其特别的矿物材料、质地被认知，其“物性”是否是自然而然的。假如它是一块玉料，被人采购作为原料并请工匠进行设计、打磨成为一件玉器；若这件作品的雕刻者的技艺广受认可，是一名知名的雕刻艺术家，则雕刻者的署名会让这件作品要高于同类材料的作品。整个过程中，匠人必然高度尊重其“物性”并依据其经验善加使用。他的雕刻工作创造了一个新的“物”态，他的署名又进一步丰富了该物件所附着的意义。

与此类似，一件设计精美的服装、一个做工精良的包，在打上了“品牌 LOGO”后，丰富了此“物”的意义。但这些意义的附着丝毫不损害其通常被视为物性的成份（精良的做工和精选的原材料）。或者有论者会质疑：若某个作品所用的材料极其廉价，甚至是无须任何材料的艺术作品（例如签名），难道也依赖于物性吗？恐怕的确如此，物性乃是我们对“物”的任何性质的使用，包括物的色彩、形状、质料、空间，也包括以上述方式呈现的物的缺失和空无（空符号）。空符号不依赖于具体的物，但其建构必须以某种物的应有而未有才能获得表意。<sup>①</sup> 卡西尔对“人文科学”的悲悯情怀，仍然可以栖居于这个被赋予了丰富意义的（亦即符号化的）“物”世界。正如梅洛-庞蒂所说，“我们不能对知觉进行习惯上的形式与物质区分，也不能将知觉的主体构想成一个可‘解释’、‘破译’并‘安置’可感物质并掌握其观念规则的意识”。在他看来，“一切知觉都在某一视阈并最终在‘世界’中发生”。<sup>②</sup>

整个过程即是——“自在世界”因人类的意义活动而澄明，分节出物世界与符号世界，进而以行动实践创造出不同的物之形态，或以更多的意义实践赋予物以更丰富的意义。在上述所有的活动中，“物”之依然为“物”，因其作为“物”的意义并不受到其他特定获义意向而稍减——就如“一斤米的意义”并不受“一顿饭的意义”影响一样。

此说并不是为了辩论“意义”与“物”何者是本质，而是说，在重置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分野后（这一分节并没有逻辑必然性，而是一个历史中的阶段性概念），符号学及其关涉的意义世界在更具开放性的同时具有完备的逻辑自洽性。“物性”也存在于这个更广义的意义世界中——换言之，“物”就是被认知和赋予的意义的一种。这种意义叠加（而非削减）的观念，秉持的是人类行动与思维实践“创造世界”的信念，它看待意义世界的方式是不断扩大和丰富。这种理解也更符合一种符号哲学指向的“文化意义世界”。诚如卡西尔所言，人类这种“符号动物”生活在其自身构筑的无法倒转的符号宇宙“气泡”之中。<sup>③</sup> 人类一切感知与认知的努力，都是在扩大、丰富这个符号气泡宇宙。而对于这个气泡之外的世界，人类只能保持一种自知之明和谦卑。

回到论题的起点，“自在世界”与“意义世界”并非一种静态的此消彼长，而是一种“互生”关系，“自在世界”是“意义世界”探究的工作预设，正如“暗”是作为“光明”的坐标而存在的“概念”，“暗”本身并不存在，它本身是“无”。同理，“自在世界”是对人类探索预设的永无止境的信仰。而“自在世界”不能说“是”也不能说“不是”“物”。因为，既然自在，也就没有进入人的对象范畴，我们只能就“自在”本身而言。根据经验世界所“推知的未知”是已经触及意义世界边界的未知，而不是纯粹意义的自在；而对于“物世界”中已经进入意义世界的部分，它们本身就是被名之为“物”的意义呈现，它们不仅不因意义世界的扩展而退却，反而是意义世界的实践结果。

① 胡易容、任洪增：《艺术文本中“空符号”与“符号空无”辨析——电影人物影像符号“不在之在”的表意机制》，《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

② 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的首要地位及其哲学结论》，第5页。

③ E. Cassirer, *The Philosophy of Symbolic Forms: Volume Three: The Phenomenology of Knowledg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7, pp. 57-60.

### 三、“客观世界”向“意义世界”的显现——作为交界面的“信息”

如前所述,“自在世界”通过主体化“认知”或“感知”而通向“意义世界”。因为,当且仅当有知觉主体时,意义才可能发生。在此,“自在世界”就转化成可被认知或感知的“对象世界”——它是一个待在结构,是符号化的条件。因此,符号的定义即是“被认为携带着意义的感知”。<sup>①</sup>注意这里的“被认为”是一个被动语态,指的是,在意义世界的生成过程中,主体意向性处于主导地位。由此,有必要继续追问“客观世界”与“意义世界”是否全然是被动的?若不是全然被动,则是否存在一个居间的交界面?

在符号学领域,通常沿用“心物双源”说,其中,“意义意识与世界的交汇,两者缺一不可”。相应地,它们之间呈现为一种“符号-物二联体”,其成立“取决于事物感知的接收者的解释意向性”。<sup>②</sup>这一命题使得“获义意向”具有关键性。由此将问题再次推进到“意义世界”的边界上。需探讨的是,在缺一不可的另一端,“世界”是如何参与意义建构的?换言之,获义意向何以照亮此处,而不照亮彼处?“物世界”只是被动地等待获义意向的照亮吗?它是否具有“呈现性”和“如其所是”的规定性?

事物有无限观相,观相之间不同,且他们的“显著性”也并不相同。不同事物的无穷观相不能彼此约同的原因,即在于他们的构成规定性并不相同。在此,可以将这些差异理解为事物规定性的不同“显现性”。如果不承认这种事物自身显现性的差异,获义意向就无法区别事物,进而导致所有事物成为王阳明所说的“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心发论”忽略了事物的显现和规定性而滑向一种唯心观。从这一点上说,“心物双源”作为符号认知的假设分节,逻辑上仍然有其可借鉴之处——文化认知需要“同中求异”与“异中求同”的结合。这种用处源于事物既包含“共名”也包含“别名”。共相是事物内部规律之同,而事物的“别名”“殊相”是进入内在规律的入口,且常常具有某种“主动显现”的性质。这里的主动,并非指它有某种表达的主观意识,而是指“自在世界”与“获义意向”发生关系时的“待在性”。

这种秩序的显现即“信息”。信息一词源于拉丁语,西塞罗和奥古斯丁等人在柏拉图“理式论”(ideas)的语境下使用此词。尤其是西塞罗,他用“informare”来表示伊壁鸠鲁(Epicurus)学派的“预辨法”(prolepsis)观念,即植入心灵中的再现形式。<sup>③</sup>该词此后逐渐偏向于科学意味,而在近代哲学中几乎消失。1948年,香农(Claude·E·Shannon)提出“信息熵”(information entropy)概念,借用热力学的概念来度量信息量。当前兴起的信息哲学,论域非常大,涉及物理学、数学、大众传播学、社会学、计算机科学、认知科学等多个学科。<sup>④</sup>

在20世纪发展起来的信息论中,“信息”被强化了“机械论”的意涵而损失了“认知属性”,进而使得“人”的位置从中退场。信息被作为与“物质”“能量”并存的构成世界的第三种要素确证

①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页。

② 赵毅衡:《哲学符号学:意义世界的形成》,第21、23页。

③ R. Capurro and B. Hjarland, "The Concept of Information," *Annual Review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ol. 37, no. 1 (2003), pp. 343-411.

④ 在15世纪,法语单词“信息”以口语形式出现,具有一系列含义:“调查”“教育”“通知或交流知识的行为”和“智力”。然后,技术术语“信息”从哲学话语中消失,好像它失去了吸引力。取而代之的是,英国经验主义又回到了原来的柏拉图式的灵感,创造了“观念”(idea)一词[从柏拉图的“理念”(Eidos)派生]。“凡从认识的对象。当一个人思考时,任何事物都是理解的对象,……无论是幻像、概念、种类或是思维可利用的任何东西”。[Locke, 1961, *Essay I*, i, 8]。这种“观念”的概念的哲学冒险源自休谟,康德和弗洛伊德德国理想主义者直至胡塞尔及以后。但像史上著名的“猫”一样,“信息”也有九条命,而当今正在重新转向一种“信息哲学”。现代科学的发展尤其是热力学和计算机科学的发展使得信息论获得了重要地位。参见 P. Adriaans and J. van Benthem, eds., *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 Amsterdam: Elsevier, 2008, p. 4.

了其作为事物属性标志的“客观性”，而以香农为代表的信息学家则进一步将其通过精确的方式度量化。度量方式即是通过 bit 为基本单元加以计算。这种拒绝阐释的比特，我们可以称之为——“信号”（signal）。通常也被称为“信息的载体”或具体形式。

在符号学的历史上，“信息”的具体形式“信号”与“符号”这两个概念是一对“欢喜冤家”，常常被符号学家讨论。卡西尔认为，“信号和符号属于两个不同的论域。信号是物理的存在世界之一部分；符号则是人类的意义世界之一部分”。卡西尔基于“信号”与“符号”的不同处置能力来区别人与动物的本质，进而建立起“人是符号的动物”的学说，他提出，“对人类言语的逻辑分析总是把我们引向一个在动物世界中根本没有对应物的具有头等重要性的成份”。<sup>①</sup> 卡西尔的这种努力，是希望通过“符号”这一概念来肯定人类作为万物之灵的高贵属性。然而，他在对同样体现（如果不是更加能体现）人类“符号”能力的“形式科学”的排斥，又使得他的这种肯定并不全面。相比较卡西尔的明确拒斥，艾柯对“信号”是否属于符号学之范畴持犹豫态度，他感到“断言这些信号对符号学研究无关宏旨，未免过于草率”。他的想法是，可以将信号视为符号学的“下阈限”，而“从信息概念中接受了许多属于自己的工具”。<sup>②</sup>

信息理论在不同学科的广泛应用，导致的明显问题之一，是将信息的客观属性与主观性混同。物理学中的信息是客观的呈现，而大众传播学中常常将信息作为知晓的内容，纳入主观要素。美国学者巴克兰（Michael Buckland）在《作为事物的信息》中论辩道，“人们并不仅仅通过刻意的交流而获取信息，也通过广泛多样的对象和事件获取信息”。<sup>③</sup> 如果将信息理论兴起的物理学和计算机科学背景纳入考虑，在处理“自在世界”与“意义世界”的交界面时，“信息”（及其具体呈现形式“信号”及具体的“讯息”）概念的引入是必须的。在尊重前人贡献的基础上，可以将信息界定为事物秩序的显现——一种有待知觉探索的客观待在建构。

这一界定，强调对认知的“待在”，同时一定程度复现了“信息”在古老哲学中“预先”的意涵，其有待“植入心灵”。此外，“信息”的概念与其他哲学家描述世界对象显现也有相通之处——康德说的“表象”、胡塞尔的“现象”都是世界与人类经验交界面的问题。此问题也是“符号学的奠基性问题”。<sup>④</sup> 可以从“信息”作为事物秩序显现来解读皮尔斯“现象范畴”中的“第一性”（firstness）。皮尔斯的“第一性”，是“意识到的那种东西的品质（它不是一种虚构）是第一性”。<sup>⑤</sup> 上述“信息”的概念与“第一性”的相通之处在于，它们都不是主观的意识的直接产物，而是事物品质、秩序的“显现性”（appearance）。

由此，引入“信息”来区分事物的显现性与获义的意向性，可为自在世界与意义世界的交界面提供一个更清楚的界说。这个引入也有助于皮尔斯符号现象学与当代传播学等学科的融合。同时，因更清晰地区分了“信号”与“符号”的来源差异，而有助于解决艾柯面临的犹豫境地。

信息是皮尔斯“第一性”指向的事物秩序品质——其不是全然被动地等待获义意向照亮，它无处不在甚至常常扑面而来。比如，地质运动可以显现为地质年代的漫长变化，也可以呈现为山崩地裂的地质灾害。后者迫使人们必须做出反应，进而思考其成因。扑面而来的“信息”以其巨大力量“显现”，对意向性起到引导作用。尽管事物观相无限，但他们的显性程度却不一致。较显著信息构成的线索，往往构成获义意向的最有可能的选择；同时，信息显现的方式也是对获义意向的限制。

由上，意向性照亮意义的方向和方式，不是任意武断的，它受到对象规定性信息显著性的影响。

①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第40-41、41页。

② Eco, *A Theory of Semiotics*, p. 24.

③ M. K. Buckland, "Information as Thing,"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vol. 42, no. 5 (1991), p. 351.

④ 董明来：《意向性的句法与句法的意向性：胡塞尔对表象与判断，及其符号表达的研究》，《符号与传媒》2018年第2辑。

⑤ 皮尔斯：《皮尔斯：论符号》，第22页。

认识上的“南辕北辙”并非绝对不能到达事物的普遍共相,但那将是环绕整个地球乃至整个宇宙的漫长旅程。当然,认识也从来不是单一线索的,因此在获义意向与信息界面的多线索交错的过程中,构成了丰富的意义世界。就此而言,“心‘物’双源”不是直接通达彼岸——“心”需要获义意向形式化,而“自在世界”需要信息界面来显现。

### 结语:意义世界的三个层面

阐明意义世界的起点和边界,是符号哲学的起点。一门“知觉符号学”既包含“官能感知”也涵盖“逻辑认知”,在这个双重意义符号世界论域内,不同语境可依据其核心对象设定相应的工作预设。如:“生物符号学”涉及的主要是“信号”和“前语言行为”;而艺术符号学或文学符号学则偏向对意义感知形式的探究。这些言说语境的区分对当前跨学科语境下的研究尤其重要。

从本文开篇提及的意义两向度(指向性、价值性)总览意义世界与自在世界的关系,“指向性意义”引领人类从已知世界向外部未知世界不断进取。人类意义世界所可能触及的仅仅是无穷观相和无限世界的规定性或秩序——其显现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信息”。因而,基于文化研究的“符号意义世界”乃是经由“信息”这一交界面实现的对客观世界的赋义。不过,人类意义世界并非只是“信息”的反应,而是以符号实践阐释、创造丰富了世界的秩序,从而生成了“意义”。这就构成了“意义世界”的第二个向度——“价值性意义”,其并不以“自在”或“未知”为前提,而是以人的符号实践与创造来丰富意义世界,创造意义世界。换言之,价值性意义维度导向一种内在精神的超越。而外部世界与内部精神世界的分野并非身体的内外,而是维度的差异。意义世界也不是通过对物世界的褫夺来实现,而是连同“物”作为实践对象本身的重构下的“丰富性”。“符号观相”既来自人的“获义意向”,又受到事物秩序显现和限制。意义在这个双向的过程中实现,这些过程的综合构成了意义社群——全部意义社群之和构成“人的意义世界”。

(责任编辑:邱爽)

## Self-affirmation of Modernity: the Profound Meaning of Hegel's Theory of Civil Society

Zhan Shiyou

**Abstract:** Self-affirmation of modernity is one significant theme of Hegel's practical philosophy, but his elucidation on it doesn't become mature until he consummates the systematic theory of Civil Society in *Philosophy of Right*. Hegel focuses on the issue of modernity since his early academic activities, and he keeps exploring and improving on this issue in the context of "the quarrel at the ancients and moderns". The concept of Civil Society, which refers to a society comprised of bourgeois or people detached from state entering into markets, provides an explicit theoretical field for elucidating the issue of modernity. Therefore, this is a marvelous conceptual creation. It is in this theoretical field that essential features of modernity, i. e., its advancement and crisis, can be truly analyzed.

One typical sign of modern society is the emergence of civil society, the modernity of which is featured as follows: (1) Its two sides, i. e., the particularity of pursuit of individual self-interests and the universality of "need-labor" system, interweave with each other.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ity is embodied in full development of both particularity and universality, the former of which, like abundance of material wealth, development of skills, establishment of rational principles, entrenchment of individual subjectivity, market economy and democratic politics, is the basis of flourishing and progressing of modern society. However, it causes troubles and crises simultaneously, like rampancy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inflation of individual subjectivity, alienation of labor, massive poverty, mechanization and superficialization of spirit. To develop universality fully will integrate and adjust outcom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 particularity, and make the best of relieving troubles and crises of modernity. (2) In civil society, the particularity of individual pursuits of self-interests emancipates unprecedentedly, which, compared with ethical entities like family that are intimate and natural, and based on love, is first reflected in the loss of ethic and restores ethicality in its evolution nonetheless. Ethicality of modern society is restored gradually by theoretical education and practical education, universal justice of judiciary, and trade guild's relieving problems of poverty and rabble (trade guild acts as limited particular universality). (3) The profound implication of Hegel's theory of civil society can only be discovered through researches from the two perspectives mentioned above. The theory not only reveals significance of historical progress of civil society by describing it as an infinitely malleable place where people can realize their modern freedom, but also faces up to inner defects of modernity. Though the defects and predicaments always exist as long as civil society endures, modern countries should endeavor to extinguish the defects, instead of ignoring them.

**Key words:** Hegel; Civil society; Modernity; Labor education; Trade guild

## A Philosophical Semiot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Categories and Interfaces of the "Meaning World"

Hu Yirong

**Abstract:** As the fundamental pursuit of human beings, "meaning" is the place wher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occurs, and the core domain of semiotics. What are the boundaries, categories and interfaces of the "world of meaning", and how does semiotics in today's academic context deal with the "world of meaning"?

Semiotics has developed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n these issues. Scholars such as Ernst Cassirer, Charles S Peirce, William James, Jakob Von Uexkull, and Zhao Yiheng have explored the boundaries of the world of meaning from different angles. Following the unfinished topics of the above scholars, the formation of the world of meaning can be understood fro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orld of meaning" and the "world in itself", the "material world" and the "objective world" respectively. Specifically, it includes three questions.

First, how does the "world in itself" enter the "world of meaning"? In other words, is the formation of the world of meaning based on "sensibility" or on "cognition"? Traditional semiotics prefers the former. From Ernst Cassirer's point of view to the development of today's academic context, contemporary "semiotics" has the dual logic of "directive meaning" and

“value meaning”, and is therefore both “perceptual” and “cognitive”—it not only realizes the reproduction of special aspects of meaning, but also includes the abstraction of formal laws.

Second, does the expansion of the “world of meaning” come at the expense of the retreat of the “object world”? Ernst Cassirer’s affirmative answer stems from the dichotomous logic of “humanities” and “disciplines” since Kant. But this answer holds a closed system view with a fixed total amount. Starting from an open system and dynamic semiotic practice, the “world of meaning” is not a deprivation of the “objective world”, but is constantly created and enriched in semiotic practice. Even the “object world” is a specific concept of the “world of meaning”, the manifestations of meaning of what is called “things”. Not only do they not retreat due to the expansion of the world of meaning, but they are the practical results of the rich world of meaning.

Third, how does the “objective world” appear to the “meaning world”? The objective world is not directly open to the world of meaning, but forms a restriction on the intention to obtain meaning by showing certain stipulations and order. This “appearance of the order of things” is “information”. It is the objective basis of symbols and the intermediary between the world of things and the world of meaning. It affects the direction and the way in which intentionality illuminates meaning.

From the above, the “world of meaning” based on perceptual semiotics can be understood as follows: First of all, a semiotics based on the two dimensions of directional meaning and value meaning is both a “perceptual” semiotics and a “cognitive” semiotics. Secondly, the world of meaning is not realized through the deprivation of the world of things, but the “richness” of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ings” as practical objects themselves. Finally, “information” is the objective order of the world and the preexisting condition of the world of meaning, and the world of human meaning is not just a simple reflection of “information” because the “value dimension” of the “world of meaning” is based on human symbolic practice.

**Key words:** World of meaning; Cultural communication; Semiotic philosophy; Information theory

## The Research Turn of Zhu Guangqian’s Contemporary Aesthetics

*Li Shitao*

**Abstract:**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Zhu Guangqian adapted to the changes of the times, adjusted his research ideas and objects, and his aesthetic research also changed greatly. We summarize this change with his four turns: translation and study of western aesthetic materials, study of philosophical aesthetics, study of Marxist aesthetics and literary theory, and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and civilizations.

With his prolific translation of Western aesthetic materials and the research achievements represented by *The History of Western Aesthetics*, Zhu Guangqian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study of Western aesthetics as an academic discipline in China and greatly promoted its development. His theory of “the unification of subjectivity and objectivity” promoted the understanding of beauty and became an important school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aesthetic research. He also made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philosophical aesthetics by expanding the study of aesthetic principles and basic theories from many aspects. He translated materials of Marxism and its aesthetics and literary theory, improved the research level of Marxist aesthetics and literary theory, discriminated and corrected the errors in Marxist translation and research, thus deepening the study of Marxism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Western schools of thought. Starting from aesthetic research, he started the stud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civilizations and their comparison in the Chinese aesthetic circle, and promoted the exchange of aesthetics, literature, culture, civilization and academia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In addition, as an aesthetician and theorist, he also intervened in the discussion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nd art, philosophy, Marxism and cultural issues,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practice. He led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humanities with a broad vision and standardized research, which not only improved the level of humanities research, but also demonstrated the achievement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academic research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Zhu Guangqian’s research turn is the result of the changing times and his personal choice, the result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any factors,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accidental and inevitable, active and passive. Of course, there are also gains and losses. In this sense, his academic turn is a subject that deserves our research. We should look at his turn in a